

誰願意留鄉？從地位同質性與社會互動 看不同地位者的地方連結與留居意願

陳祈璋、顏詩耕

145

誰
願
意
留
鄉
？

感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國立中正大學提供《國立中正大學培育優秀全職本國博士生獎學金》，讓我能全力撰寫本論文。本文初稿曾於2023年臺灣社會學年會發表，臺北大學社會系陳宇翔教授提供了寶貴意見。後續修訂版本亦於第17屆南方社會工作暨社會福利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中，獲得阮曉眉副教授的回饋。本研究亦曾提交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修業指導委員會，並獲兩位匿名審查人詳實建議，對釐清論述盲點有所助益。最後，誠摯感謝《臺灣社會學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批評與指正，使本文觀點更為聚焦清晰。若有未盡周延之處，文責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4.12.31 接受刊登：2025.06.30

陳祈璋(✉)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通訊地址：62130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社會科學院社會福利學系

Email：j718293794613@yahoo.com.tw

顏詩耕(通訊作者)(✉)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通訊地址：62130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社會科學院社會福利學系

Email：siking.gan@gmail.com

摘 要

鄉村人口減少所引發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危機，已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理解誰願意留在鄉村生活，有助於藉由政策減緩社會遷出。本研究從兩個面向切入：其一，聚焦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探討社會流動的端點；其二，關注鄰里網絡與社區參與，建構不同社會地位者的地方連結路徑。本文使用《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第一期第一次資料，針對25歲以上樣本進行線性迴歸與交互作用分析，並以教育程度在同區域、同世代中的相對位置建構四組社會地位。結果顯示，社會地位越高，留居意願越低；地位同質性不具直接影響，而社區參與及鄰里網絡皆和留居意願呈正相關。進一步分析指出，同質性區域與鄰里網絡都能提升地位最低者的留居意願，支持出於「依賴」與安全感而留下的解釋。雖然社區參與對最低地位者效果有限，但能提升其他群體的留居意願，顯示其作用並非如選擇性歸屬感所假設般，僅局限於高地位者。另一方面，高地位者的留居意願亦會隨鄰里連結的增強而提升，顯示其與居民的關係並不僅止於表面。總結而言，遷移與否不僅是應對不平等與追求社會流動的選擇，更牽涉個人與地方之間的社會—情感連結。促進跨地位群體之間的日常互動與集體參與，應是「地方創生」政策可欲的治理方向。

關鍵詞：留居意願、社會地位、地位同質性、社會互動、地方創生

Staying in the Countryside? How Social Status, Status Homogeneity and Local Social Ties Shape Rural Stay Aspirations

Chi-Wei Chen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hih-Keng Yen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Rural population decline involves both economic forces and social dynamics rooted in local attachment. This study uses information on social status, status homogeneity, neighborhood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examine what kinds of individuals are more willing to stay in rural Taiwanese communities. Data from the 2019 Taiwan Rural Social and Cultural Survey and a sample of adults aged 25 and above show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social status are less willing to stay, and that neighborhood ti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tay aspiration. Especially among those with the lowest statuses, strong neighborhood networks and high levels of status homogeneity significantly enhance willingness to stay, reflecting a dual sense of reliance and security. Althoug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xerts limited effect on individuals in the lowest-status group, in other groups it supports decisions to remain in a rural area. Higher-status residents' stay aspiration, in turn, strengthen with stronger neighborhood ties. The findings clearly suggest that decisions to stay are shaped by a mix of struc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bonds, thus offering insights for place-based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Keywords: stay aspirations, social status, status homogeneity, social interacti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一、前言

鄉村人口流失已成為全球已開發國家普遍面臨的挑戰 (Hospers and Syssner 2018; Martinez-Fernandez 2012; 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 Sousa and Pinho 2015)。實際上，臺灣自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以來，學者即密切關注部分鄉鎮市區的人口絕對減少 (施添福 1979；蔡宏進 1979)。近 20 年來，臺灣整體的人口遷移趨勢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均高度相關，人口集中於相對成熟或具成長潛力的都會地區。北部的臺北市、桃園市、新北市等新興城市，以及中部的臺中市，持續吸引大量人口遷入 (劉一龍 2012)。根據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人口朝中北部集中的趨勢至今依然明顯，而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與屏東縣等地區，則持續面臨人口流失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1)。

然而，縣市內部人口分布並不均衡，有些鄉鎮市區的人口減少更多，也更快。針對此情況，政府於 2018 年推出《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以人口變化率、人口規模與居民收入等指標，選定 134 處鄉鎮市區做為「優先推動地區」(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這些地區僅占臺灣總人口的 11.6%，卻涵蓋 66.5% 的國土面積，反映出空間發展與資源配置的高度不均，且多集中於中南部山區、沿海及東部山區。

人口分布與遷移研究密切相關。無論本土或國外的遷移研究，長期以來聚焦於已經「實踐」(realization) 的遷移現象，關注遷移者的特徵，或探討城鄉不均結構如何維持人口分布的不平衡。近年，有學者開始反思此研究框架的局限，並指出其無法充分理解、解釋「為何人們仍留在鄉村」(Schewel 2020; Stockdale and Haartsen 2018)。於是，當代臺灣農村居民如何表達其在地生活的未來意願 (aspiration)，成為本研究的動機。

我們採用「留居意願」(stay aspiration)，表達「個人在移動上的心緒及願望」(Schewel 2020)。留下或離開居住地的傾向，可理解為個人在追求社會流動的渴望，以及在地方生活的社會—情感關係中，權衡日後的搬遷。然而，傳統遷移研究長期忽視意願層面的重要性，傾向假設有能力移動者會選擇離開，並將留在原地的人視為「被迫留下」。Aslany 等人 (2021) 針對遷移意願的系統性回顧指出，社會經濟地位越高，遷移意願不必然越強。近年居住流動的研究也發現，社會地位與社會流動間的關係並非線性，而必須考量個人與居住背景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 (Galster and Turner 2017, 2019)。為了探究農村居民如何表達留居願望，我們援引「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兩個概念，理解社會流動與遷移意願之間的關係。

那麼，如何理解個人與地方的互動，及其社會—情感關係？Schewel (2020) 認為留居意願的基礎，乃是個人在地方社會網絡中的「鑲嵌性」(embeddedness)，也就是居民的日常互動是否深植於特定生活場域，並對該地產生持續的承諾與參與傾向。對此，不同學科提出了互補但各異的詮釋路徑：社會學強調個人透過鄰里與社區參與等日常互動，獲取資訊、財務與就業等資源，形成可信賴與運用的社會資本；人文地理學則著眼於這些關係如何轉化為情感連結，使個人對地方產生認同與依附感。¹ 本文則認為，互動面向是情感連結的表達形式之一，旨在探究：個人於日常生活中與居民的互動關係，如何形塑了留居意願。

高社會地位者的流動潛力，是否必然與地方發展產生衝突？低社會地位者，又是否總是傾向留下？近年質化研究對此提出辯駁。Savage 等學者批判「流動性即現代性」的假設，指出在全球化脈絡下，地方性 (locality) 並未被消解，反而成為部分群體用

1 文獻探討第三部分的「身在地方的社會互動：鄰里與社區」對此有進一步討論。

以累積資本與重塑身分的場域 (Savage 2008; Savage et al. 2004, 2010)。其中，高社會地位者透過參與與自身身分相符的社團與社區活動，發展出「**選擇性歸屬感**」(elective belonging)，從而認為居住地適合自己。相對而言，有學者則認為低地位者對於社會網絡的瓦解更為敏感。這些網絡不僅是資源的主要來源，也牽涉安全感與地方的情感連結 (Folkes 2022; Jeffery 2018; Paton 2016)。

近年鄉村研究亦採納類似觀點。移居鄉村的中產階級，雖會反思原本的遷移決定，但在適應過程中，特別是出於對子女教育的投入，會逐漸參與社區，並發展出對地方的情感訴求，最終將此做為留居依據 (Haartsen and Stockdale 2018)。與之相對地，久居鄉村的勞工階級青年，則可能因同儕外流或與富裕群體的社會差距，產生「受困」(stuckness) 經驗，對家鄉產生矛盾與衝突的情感 (Cuervo and Wyn 2017)。因此，**本文亦將探討不同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及社會互動的交互作用，辨識哪些群體對在地關係的變化更為敏感，進而影響其留居意願。**

本研究旨在透過社會流動與地方關係兩個面向，理解農村居民的留居意願，以期為減緩鄉村人口外移提供建議。²此外，本研究也試圖釐清不同社會地位的居民，孰對於與地方關係的發展或脫節更為敏感，從而影響留居意願。為了此研究目的，本文使用《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2019年第一期第一次一般問卷做為主要資料。第二節將回顧本土遷移研究，以及當前遷移研究視框的轉向，接著探討社會流動（社會位置與地位同質性）、社會互動與地方關係（鄰里網絡與社區參與），以及二者間關聯的文獻，並建構假設，特別指出不同地位者考量留居意願時，其居住脈絡以及社會互動途徑有所差異。第三節呈現資料性質、依變項

2 考量行文的流暢度，並在不影響語意的前提下，「鄉村」與「農村」於文中交替使用，指涉相近的地方及社會脈絡。

與自變項的操作方式。第四節則透過逐步迴歸與交互作用效果圖呈現結果。最後一節提出結論與討論。

二、文獻綜覽暨研究假設

我們先來回顧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討論。本節首先梳理臺灣不同時期的遷移研究，以探討其背後所預設的理性選擇模型與推拉模型。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這些模型一直是遷移研究的主流典範。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主張，遷移研究應當納入「意願」，而不應僅關注遷移的「實踐」。據此，本研究透過「留居意願」的視角，探討當代農村居民留在鄉村的意願。

接著，我們討論三組與留居意願相關的理論脈絡。首先，從社會流動與位置取得的視角，探討其與遷移意願之間的關聯，並聚焦於「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兩個核心概念。其次，釐清個人與地方之間的關係，藉由檢視「社區依附」與「社會資本」兩個相關概念在遷移研究中的應用，指出兩者在互動層次上的交集，並將「**社會互動**」視為情感連結的表現形式之一。最後，我們回應都市社會學者針對不同地位群體如何發展或維持與地方間的互動—情感連結關係的辯論，說明地位同質性、社區參與和鄰里關係，如何在不同社會地位群體之間，調節留居意願。

（一）從遷移實踐到遷移意願：遷移研究的視框轉向

相較於歐美研究對遷移意願的重視，臺灣本土研究長期以來的關注重點，仍集中於遷移的「實踐」。本文先回顧臺灣遷移研究的發展，說明其如何深受推拉模型與理性選擇觀點的影響，再探討近年歐美研究中「留居／意願」的轉向。長期以來，本土遷

移研究的焦點，圍繞都市化歷程中的城鄉遷移，以及縣市間人口流動的不均衡格局如何維持。這些研究呼應遷移研究的理論發展，關注人口快速流動時期的空間—社會結構變遷與遷移篩選機制，試圖解答：人口遷移如何與城鄉或縣市發展的不均衡格局共構？哪些群體更可能遷移、擁有更大的移動能力？

臺灣遷移研究的發展脈絡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1960 至 1980 年間，學者的核心關懷集中於鄉村向都市遷移的強度與人口分布的空間變化。他們透過分析鄉鎮市區間的人口組成與社會特徵變遷，呼應當時都市化的進程，判斷哪些鄉村地區出現了人口絕對減少的趨勢（張明正 1979；蔡宏進 1979；施添福 1979）。

1980 年以後，研究重心轉向空間結構與遷移之間的關係。學者開始藉由比較各縣市的經濟發展與基礎設施分布，以及人口遷移的數量，明確指出空間推拉效果如何形塑人口分布。此階段的研究進一步分析了經濟發展指標與公共設施的完備度（邊瑞芬 1991）、勞動市場的就業機會、平均薪資與產業發展（洪嘉瑜等 2003），乃至高薪、較多就業機會與高房價之間的折抵作用與都市擴散現象（薛立敏等 2003）。此外，交通設施的發展，亦加速了都市邊界的擴張（薛立敏等 2002）。近年研究亦指出，高所得、低失業率、居住空間寬裕與社會福利支出較多的縣市，仍擁有較強的人口吸納能力（王千岳、邱冠瑋 2023）。

上述研究主要聚焦於人口移動的不均衡空間格局。然而，自 2000 年以後，研究開始轉向分析個人層次，探問「誰是遷移者」。部分研究著力於描繪遷移者的整體輪廓，一致指出教育程度越高，遷移可能性越大，而傳統的性別化遷移模式則逐漸消退（洪嘉瑜、銀慶貞 2008；薛立敏等 2007）。同時，勞動遷移也成為焦點。部分研究主張，「功成名就」的文化，讓勞動者願意承擔薪資損失與較高租金，以換取職涯發展的機會（張慈佳、胡海

豐 2006)。另一類研究則強調，遷移能否帶來機會，取決於個人所擁有人力資本。當面臨失業情境，人力資本越高，越能持續遷移，反之則回流（林季平、廖高禮 2011）。

這些研究預設了人是經濟理性的主體，會理性評估不同空間中的教育投資回報、產業結構與就業前景，以及都市住宅市場與生活品質，進而決定是否遷移。這樣的研究視角無疑是重要的。一方面，它反映了人口流動與社會結構變遷的關係，特別是遷移受到都市化進程、勞動市場結構、產業發展與公共基礎建設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些研究也凸顯教育與性別不平等形塑了遷移模式，並指出區域間公共資源與經濟投資的不均衡，加劇了人口分布失衡。

從理論發展的角度來看，臺灣的遷移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實踐」。多數研究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s）之上，主張遷移是個人為了最大化預期收入所進行的成本—效益評估（Massey et al. 1993, 1994）。相對而言，臺灣對其他理論典範的應用則較為匱乏，包括：家戶因應原鄉脈絡與相對剝奪感而協商遷移策略的新遷移經濟理論（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關注全球結構性不平等的勞動市場區隔理論（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與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以及探討遷移行動如何在社會關係中被強化與再製的社會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與累積因果理論（cumulative causation）（Massey et al. 1993, 1994）。

然而，即便這些理論豐富了對遷移實踐的理解，鮮少有研究進一步探討人們「為何渴望離開或選擇留下」，也就是移動的「意願」較少被分析。當研究重心僅聚焦於遷移事件的發生，便可能忽略人們面對的更深層社會與文化脈絡，及其心理動力。歐美學界近年發展出新的理論視框，回應上述問題。Carling 及合作

夥伴 (Aslany et al. 2021; Carling 2014; Carling and Collins 2018; Carling and Schewel 2018) 在近年的批判性回顧中指出，傳統遷移研究依賴理性選擇模型與成本—效益分析，過度關注實際的遷移行動，既忽略了「(未)流動性」(im/mobility)，也未充分考慮「意願」這一遷移的初始階段。³ 因此，Carling 等學者主張，遷移過程應透過「理想—現實」的對位，拆解為「意願—實踐」的雙階段模式。

學者對「意願」採用多種近義詞進行詮釋。Carling 等學者 (Aslany et al. 2021; Carling and Schewel 2018) 彙總相關研究發現，意願大致與慾望 (desire)、偏好 (preference)、意圖 (intention)、期望 (expectation)、考量 (consideration)、可能性 (likelihood)，以及意向 (wish) 等詞彙相近。儘管這些詞彙的定義略微不同，但皆指涉**個人在移動上的心緒及願望**。

此外，相較於「遷移意願」，「**留居意願**」更少受到關注。儘管 Schewel 曾與 Carling 合作，提出二階段模型的分析與應用方法 (Carling and Schewel 2018)，但其日後批評當時的討論仍帶有「流動性偏見」，並轉而將重點放在尚未被充分理解的留居意願 (Schewel 2020)，以挑戰傳統遷移理論中「若人們有能力，他們就會選擇遷移」的經濟理性假設。

相較而言，臺灣針對遷移意願的研究仍相對稀少、學門分散，也未能緊接這波理論轉向。例如，章英華 (1994) 透過 1991 年社會意向調查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傾向遷往都市或郊區，顯示個人教育程度與城鄉產業分級之間存在高度的遷移誘因。葉

3 遷移研究中，「遷移」與「(空間)流動」雖然密切相關，但兩者並不完全等同。遷移通常是指個人或群體在地理空間上的位移，並伴隨較長時間的居住地變更。而流動則是一個更廣義的概念，泛指各種形式的地理移動，包括短期移動、跨區通勤、甚至季節性遷徙等。Carling 與其合作者提出「(未)流動性」的概念，正是藉由這一包容性較強的詞彙，提醒我們遷移研究不應只聚焦於實際的移動行為，也應進一步關注人們為何不移動——不論是因為缺乏意願、出於主動選擇，或受到結構性限制所迫。這樣的觀點，促使我們將實際或想像的「不移動」，視為同樣值得理解的社會現象。

晉嘉與張旭豐（2011）則指出，年輕人的理想居住地點受其價值觀影響。王怡雯與張政亮（2006）的研究顯示，臺南市居民因居住時間較長、擁有房屋，以及滿意生活環境，而更願意留居。

總而言之，遷移研究逐漸發展出新的分支，嘗試從「行動結果」轉向「意願」的角度，理解人們的流動性。對臺灣來說，「留居意願」是一個相對新穎的觀點；此外，即使目前鄉村人口流失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國內針對農村遷移的量化研究，近年仍相對稀少。因此，本研究嘗試從留居意願的角度切入，呈現當代農村居民選擇留在鄉村居住的主觀意願、背後的社會經濟脈絡，及其與地方的連結程度。

（二）社會流動的意向：社會地位及地位同質性

傳統上常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與遷移的渴望或能力呈正相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為居住流動研究中的「居住取得模型」（residential attainment model）（Logan and Alba 1993; Massey and Denton 1985; Massey and Mullan 1984）。此觀點認為，具有（或有潛力獲得）高社會地位者，將藉由遷移行動，進入條件更優越的社區環境，以獲取更好的工作與收入機會、鄰近上層社群，進而累積社會與文化資本，實現向上流動的目標。

近年的農村研究也指出類似趨勢：**遷移常被視為一種取得或維持社會地位的途徑**。在農村經濟與就業前景持續惡化的脈絡下，形成了一種「離開才能向前走」（move forward）的文化期待（Carr and Kefalas 2009），鼓勵具備條件者盡早遷離。近年研究也發現，高地位者相較於低地位的居民，的確更傾向透過遷移實現社會流動與成就（Cuervo and Wyn 2017; Farrugia 2020; Niccolai et al. 2022）。據此，**假設 1A 為：在農村區域中，高地位者的留居意願較低；反之，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較高。**

然而，Schewel（2020）認為，遷移意願與社會地位之間的關係其實更為複雜。例如，有些居民教育程度較低、資訊取得有限，可能從未將遷移視為可行選項；但也有些低社經地位者，正因在地生活中感受到局限、目睹同儕發展得更好，或長期面對物質剝奪，而強烈地渴望離開。相對而言，部分高社經地位者則可能因已有穩定事業與充足社會資源，毋須遷移也能過上理想生活。Aslany 等人（2021）系統性回顧遷移意願的研究，質疑「高社經地位者更可能遷移」這一線性預設。他們發現，多數研究反而指出：**社經地位越高，遷移意願越低；也就是說，真正想離開的，往往是最缺乏遷移能力的低地位者。**

進一步聚焦於鄉村地區，也有研究發現，社會地位與遷移意願呈現相反的關係。Fabiansson（2015）針對鄉村高中生的研究發現，主觀地位越高的青年，不僅對未來充滿信心，也更信任社區民眾、感受到社區與親友的支持，並認為鄉村就是「家」，若非就業機會不足，其實不願離開。Lee 與 Lee（2019）比較韓國農村與都市居民後亦指出，在農村地區，主觀社會地位越高的居民，其遷移意願反而更低。他們解釋，農村社會具有高度人際熟識性與互動密度，更容易在日常互動中辨識出自身的社會地位。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1B：在農村區域中，社會地位越高的居民，其留居意願越高；相對而言，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則較低。**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社會經濟地位與遷移意願之間，與典型假設有所不同的、更為複雜的關係？關鍵在於「**比較**」。Aslany 等人（2021: 27）反省道，現有研究中，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方式，是否能真正捕捉到個人的「相對剝奪感」，仍存在明顯差異；畢竟「遷移意願的形成與社經地位之間的關聯，具有明顯的關係性（relational）與複雜性」。這正是 Massey 等人（1993, 1994）所強調的新遷移經濟理論的核心概念，意即，人們是出於在社區中相對較差的經濟景況，才在家戶層次上被鼓勵向外遷

移。

我們認為，這一理論缺口可藉由近年居住流動研究的新發展予以補充。傳統模型固然強調社會地位與遷移行動之間的正相關，然而，近年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個人與鄰里之間的「**地位差異**」——亦即**環境脈絡**——是理解遷移動機的關鍵。Galster 與 Turner (2017, 2019) 認為，遷移的動機往往不只是為了向上流動，而是出於人們偏好「地位相近」的社區。由於人們是透過與鄰里居民的比較，來感知自身社會位置，當人們認為自己與周遭居民的地位落差過大——**無論是自愧不如，或認為他人「格調」與自己相差甚遠**——皆可能驅動遷移意願。我們將此一現象概念化為「地位同質性」，並視之為社會地位與留居意願之間的第二層次關係。據此，我們提出**假設 2：地位同質性與留居意願呈正相關；亦即，當居民居住在與自己社會地位相近的區域時，則留居意願越高。**

(三) 身在地方的社會互動：鄰里與社區

Schewel (2020) 提出「未流動轉向」，並主張應關注「留居意願」時，強調了「**鑲嵌性**」這個關鍵概念，用以描述個人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黏著程度。Schewel 指出，個人對於未來是否遷移的想法，往往受到其與在地社群的日常互動、信任關係與承諾影響。據此，留居不應被視為靜態的狀態，而是一種持續協商滿意與不滿、慾望與現實、選擇與限制的生活實踐 (Coulter et al. 2016)。移動因此不僅是空間的位移，更反映了人際關係的建立方式，與生活之道的表演 (Adey 2013 [2009])。

不同學科大致發展出「互動」與「情感」兩種詮釋視角，用以理解個人與地方的連結，以及其與留居意願間的關係。在社會學領域中，「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雖非僅限於「互動」，

但其核心仍仰賴穩定且持續的社會互動。無論是公民參與、信任與互惠規範，或是動員社會網絡獲得資源以達成個人目的，前提仍是個人與社群之間的互動實踐（Bourdieu 1986; Putnam 2000; D’Ingiullo et al. 2023）。當這些關係鑲嵌於特定地方時，遷移便可能折損既有的社會資本，使個人較難繼續取得資源、獲得支持與解決問題，因而提高離開的機會成本，並降低遷移意願（David et al. 2010; Kan 2007）。相較之下，人文地理學聚焦於「社區依附」（community attachment）或歸屬感（belonging），強調人與社區互動衍生了心理層次的認同，或情感連結。此種依附，使得個人擔心遷移將導致人際網絡解組，或割捨熟悉且認同的生活模式（Aslany et al. 2021; Kley 2011, 2017; Schewel 2020）。

儘管社會資本與社區依附源自不同的理論脈絡，但兩者在經驗研究應用上，卻時常出現重疊與模糊的界線。這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許多研究者透過觀察鄰里網絡、社團投入及公民參與的活躍程度，以互動層面測量社會資本（David et al. 2010; D’Ingiullo et al. 2023; Kan 2007）。其次，也有學者將社會互動視為社區依附的外在表現。例如，Jennings 與 Krannich（2013）將社區參與視為個人依附於社區的表現。Gielsing 與 Haartsen（2017）透過村民的拜訪或與村民聊私事，測量社區依附。Aslany 等人（2021）針對遷移意願的統合分析，則將歸屬感、社區滿意度、人際信任與社會資本，放在依附及參與的層次。

在理論層次上，社會資本所強調的個人與社區互動，被視為社區依附的核心面向之一（Clark et al. 2017; Lewicka 2011）。Kao 與 Sapp（2020a, 2020b）是少數獨立測量社會資本與社區依附的研究，他們發現前者可強力地預測後者：穩固的社會網絡及互動，還有高度的信任感，有助於強化個人對社區的情感認同。然而，這樣的影響是單向的——社會資本能促進依附感；但反過

來，社區依附卻無法形成社會資本。

因此，儘管「社區依附」與「社會互動」在理論脈絡中屬於不同構念，在實證層次上卻有高度的重疊：互動被視為依附的外顯特徵，而依附則是互動積累後的內化結果。我們最終聚焦於**個人與社區的互動和參與**，將之理解為在地生活的實踐與日常連結。這些互動也反映了個人對社區的情感關係。本文之所以採取此做法，是基於理論及方法上的考量：其一，依變項「留居意願」本身就是未來是否遷移的主觀心理判斷，若同時將社區依附的情感面向（如「認為此地是家」）做為自變項，可能導致心理構面的重疊，進而出現自變項與依變項概念上過於相近的問題。其次，下一節的文獻將說明，**不同層次的社會互動，對於不同社會地位的居民來說，意義與功能不同**。因此，從互動層面切入社區依附，用意也是捕捉不同群體留居意願的社會脈絡。

本研究關注的社區互動形式有二：其一是**鄰里網絡**，指個人在日常生活或突發情況下，能從鄰居獲得幫助與支持的非正式人際連結，屬於高頻率、在地化、以熟識為基礎的社會關係（Clark et al. 2017; Gieling et al. 2019; Kan 2007; Kao and Sapp 2020a, 2020b）。其二為**社區參與**，泛指參與社區事務、追求共同目標並進行集體行動，屬於較具組織性與公共性的社會參與形式（David et al. 2010; Jennings and Krannich 2013; Lee and Lee 2019）。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3：鄰里網絡與社區參與皆正向影響留居意願；亦即，當居民在社區中的連結越強，其留居意願也隨之增強。**

（四）基於社會地位而異的脈絡考量與互動路徑

越來越多研究指出，不同社會地位的居民，會透過不同路徑，選擇並維持與地方的連結。這些研究的核心概念，仍在於

「比較」。不過，隱含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比較模式。對於高地位者而言，他們建立與地方關係的途徑是「劃界」，旨在選擇性地參與某些社群活動與空間實踐，同時排除其他與自身格調不相符的人群與場域。對於低地位者而言，重點則在於維持與親友或鄰里網絡的熟悉連結。

接著，我們將透過社會地位分別與地位同質性、社區參與及鄰里網絡三組自變項的交互作用，闡述「比較」如何體現在不同地位居民的留居意願。

1. 誰更在意與相似背景的人相處？

關於「比較」的討論，源自都市社會學者在質性研究中，對不同地位者如何發展或維繫地方關係的辯論。本節強調，不同社會地位的居民，對其所處環境的敏感性與詮釋方式並不相同。與背景相似的人住在一起（即地位同質性），不僅涉及一種社會比較的機制，更攸關身處不同地位的人，是否能在當地建立並維繫其所欲的日常生活型態，進而形塑對地方的情感連結。因此可以推論，社會地位可能調節地位同質性對留居意願的影響。

首先，都市社會學者 Savage 認為，高地位者並不只是訴求流動性與移動，反倒是透過離散的方式，與愛好及價值觀相似的居民生活在一塊，重新建立起自身與地方的關係（Savage 2008, 2014; Savage et al. 2004, 2010）。高地位者雖與鄰居保持距離，卻在教育或消費等社會場域中，建立習癖相符的社交網絡（Benson 2014; Benson and Jackson 2013）。

換言之，地位同質性可能是影響高地位者留居意願的重要條件。近年居住流動研究指出，與類似背景的人生活在一塊的動力，在高收入群體中尤為明顯（Galster and Turner 2017, 2019; Hedman et al. 2011）。基於此，本文的**假設 4A 為：地位同質性**

提高時，高地位群體的留居意願上升幅度高於低地位群體。

另一派學者反對前述說法。理由在於 Savage 假設了低地位群體只是緬懷過往或傳統的地方記憶、家庭歷史與社區根基，因此對地方的情感關係是靜態而不變的。但是，有研究指出，低地位群體也重視是否能與相同背景者共處 (Folkes 2022)。尤其是低地位的勞工階級，往往從相似背景者 (sameness) 獲得物質與社會支持 (Paton 2016: 108)。學者於是質疑，高地位群體總是能規避風險、保持與居民的距離，就像「空降部隊」(parachute) 一樣來去自如 (Paton 2016: 119)。他們認為，高地位的居民不太可能真的僅因新建立的社會網絡或生活方式，就願意留下來居住。

換言之，**假設 4B 反倒認為：地位同質性的作用對低地位群體更具效果。當低地位者居住於與自身背景相似者比例較高的區域時，其留居意願較高；反之，當同質性較低時，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將因不安全感而顯著下降。**

2. 參與或是依賴：不同社會地位者的互動路徑

不同社會地位的群體，在建立與地方的關係並表達對居住地的情感時，方式相左。Savage 一脈的學者，將高地位群體重新連結至地方的過程，稱為「選擇性歸屬感」。雖採用「歸屬感」一詞，其核心內涵仍是將個人與地方的關係，理解為「互動」與「情感」。Savage 等人 (2004: 53) 指出：「當代入必須搬家，透過選擇居所，以此努力地確認，並感受 (sense) 到他們是誰」。具有「**選擇性歸屬感**」的高地位群體，是「今天來、明天仍在此的人，他們選擇在某個地方生活，並努力在此展開生活」(Savage et al. 2004: 53)。

後續研究指出，高地位群體傾向追尋「與自身相符」的居

住地，並積極參與其中。對中產階級而言，參與社區組織與公共事務，是形塑地方認同與建立在地身分的重要途徑（Savage 2008, 2014; Savage et al. 2010）。他們透過「所在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place），轉化地方或積極維護理想中的種族與階級組成，動用文化資本召喚地方歷史，建立且宣稱在地的新身分（Benson and Jackson 2013）。同時，他們也逐步調整對地方的期待與自我定位（Benson 2014）。

鄉村研究也觀察到相似的趨勢。Haartsen 與 Stockdale（2018）沿用選擇性歸屬感的概念，發現許多遷居農村的中產階級移居者，透過參與社區活動與地方事務，逐步建立起對當地的情感連結。儘管他們對當地文化可能仍有所保留，但持續參與使其逐漸融入地方生活，並將留居視為可行選項。Fabiansson（2015）則發現，家庭社會地位越高的青少年，越可能表現出對地方的認同與情感連結，也更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他進一步指出，這種參與可視為一種社會化歷程：當高地位家長融入社區生活時，亦更傾向鼓勵子女投入地方事務，進而鞏固下一代與地方社群之間的情感連結與責任感。

總括而言，高地位群體建立在地認同與社會位置的方式，是積極地「參與」社區事務，並因此發展出較強的留居意願。據此，本文提出**假設 5：社區參與及留居意願之間，存在社會地位的交互作用效果；即社區參與程度越高，高地位群體的留居意願提升幅度越大。**

相對地，也有研究指出，低地位群體與居住地的情感連結，往往根植於其與相似背景居民共同生活的經驗。具體來說，個人與鄰里連結的基礎是物質、情感與照顧上的實際支持。無論是都市研究（Folkes 2022; Paton 2016），還是鄉村研究（Clark et al. 2022; Klimt 2014; Miller and Edin 2022），均發現低地位居民往

往強調鄰里與親友所提供的經濟援助、育兒協助與日常支持，這些因素成為他們選擇留下的重要依據與安全感來源。

換言之，相較於高地位群體，低地位者更重視與親屬、鄰里之間的關係維繫。此一現象亦可見於美國社會學界對不同族裔與社經階層的遷移傾向之研究。採用美國國民收支動態追蹤調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的研究發現，普遍而言，居住在父母、子女或親屬附近，能降低個人遷移的機率（Ackert et al. 2019; Spring et al. 2017）；不過，這種效果在低收入族群和少數族群身上更為突出（Spring et al. 2017）。此外，非裔及拉丁裔美國人也可能會遷入貧窮、但親屬網絡集中的地區（Ackert et al. 2019）。最新研究則指出，目前僅有高收入白人傾向搬離親友鄰近地區，其他族群則仍傾向留在親友附近（Spring et al. 2023）。

總之，研究普遍指出，低地位者「**依賴**」鄰里與親友網絡提供的支持。在這種情境下，遷移不僅意味著換個地方居住，更可能中斷生活必要的支持系統，對其生計與穩定造成風險。因此，鄰里網絡的存在與強度，將明顯地提升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6：社會地位調節鄰里網絡與留居意願之間的關係；其中，低地位群體隨著鄰里網絡增加，其留居意願的上升幅度，明顯高於中高地位群體。**

三、資料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2019 年第一期第一次一般問卷調查資料，樣本數為 3,321 筆。其農村母體參考了《農林漁牧業普查》、《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公務統計資料，並採用分層抽樣法，將全臺農村劃分為 20 種型態，共

抽樣 145 個村里，堪稱目前最新且具代表性的臺灣農村資料庫。

(一) 依變項

留居意願的測量，被視為是「評估遷移做為一種潛在行動」(the evaluation of migration as a potential course of action) (Aslany et al. 2021; Schewel 2020)。我們合併第一波調查中第 31 題組「下列對於您與社區的說法，請問您同不同意？」的四個題項：a (您打算以後繼續住在這個社區)、b (如果要搬離開這個社區，您會很捨不得)、c (可以選擇住的地方，您還是要選擇這個社區)，與 d (您想搬離這個社區)。本研究聚焦於留居意願，依序將 a、b、c 回答「很同意」者給予 3 分、「同意」為 2 分、「不同意」為 1 分、「很不同意」為 0 分；d 則採反向編碼，再予以加總。然而，部分受訪者未完整作答，致使有效樣本減少 175 筆。

(二) 自變項

1. 社會地位

本文所強調的社會地位，以及隨後提出的地位同質性概念，旨在探討個人如何評估自己在居住環境中，與鄰里之間的相對地位。相關研究中，Musterd 等人 (2016) 將家庭可支配所得與其所居鄰里中位所得之間的差距，界定為「社會距離」。Galster 與 Turner (2017, 2019) 則提出「地位不一致」(status discrepancy) 與「地位組成」(status composition) 兩個概念，前者指涉個人與鄰里中位所得的相對位置；後者則關注鄰里內不同社會地位群體的比例分布，兩者皆被視為影響遷移的重要因素。

雖然這些研究皆以「所得差距」做為衡量社會地位的方法，但若要採用個人與周遭群體的比較邏輯，則研究需同時具備個人層次與區域層次的資料。在實務上，這樣的資料條件不易達成。其一，若以職業地位量表操作，常面臨難以掌握地區層級職業分布的限制；其二，即便採用所得做為指標，雖然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臺可提供家戶層級的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但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庫中，家戶所得變項遺漏值比例偏高，作答為「不一定」、「拒答」或「不知道」者共計 985 筆，占總樣本約 28%。

基於上述限制，本文最終採用個人教育程度做為可普遍觀察的地位指標，並結合鄉鎮市區層級的教育分布資料，建構一個兼具個人與脈絡層次的社會地位變項。需特別指出的是，這裡的社會地位更接近於一種「脈絡地位」(status context)，與傳統社經地位或職業聲望概念有所不同，強調的是個人與鄰里之間的差異，必須放在特定脈絡中加以解讀。具體作法為：將各地區的教育程度按百分等級劃分為四組 (0-24.9、25-49.9、50-74.9、75-99.9)，以反映同一地區、同一世代之間的教育相對位置，做為衡量個人社會距離的基礎，亦即採用教育的「脈絡取得」(contextual attainment)。

此方法具有三個優點：(1) 鄉村地區的人口遷移具有選擇性，在某些地區，高中即為最高學歷，若以全國共同尺度衡量教育差異，恐無法反映個人於地方的地位，故需納入地域脈絡；(2) 社會經濟資料中，教育資料相對完整且更新頻率高；(3) 教育程度不僅能普遍觀察，也相對穩定，適合用以建構相對位置的評估架構。

具體換算方式如下：考量本資料庫調查年份為 2019 年，本文自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臺，取得同年度各鄉鎮市區之教育結構

資料，⁴依年齡組（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以上）與教育程度（未滿小學、小學、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與博士）計算比例分布。舉例而言，若嘉義縣大林鎮一名 26 歲青年擁有大學學歷，根據該區該年齡層之教育分布，低於該學歷者的累積比例約為 30%，大學學歷者占 57.45%，則其教育百分等級為 $30\% + (57.45\% \div 2) = 58.73$ 。依此邏輯類推。

2. 地位同質性

由於本文透過脈絡地位來建構社會地位，衡量的是相同地區及世代的教育程度位置，因此，地位同質性亦以教育程度資料捕捉。計算方式是將受訪者所居鄉鎮居民的教育程度分為三類：國中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以上。假如受訪者的學歷為專科大學以上，地位同質性的分數即為該地區專科大學以上居民所占比例。

3. 鄰里網絡

本研究使用題組 n21 「請問您平常一天裡面，從早到晚大概總共跟多少人（含同住家人）接觸？」的回答選項——0 人、1-4 人、5-9 人、10-19 人、20-49 人、50-99 人、100 人以上——以各區間的組中點轉換為連續變項。接著，根據題組 n21b 「請問這些人裡面大概有多少是住在附近的鄰居？」所採用的五點量表，分別乘上 100%（都是或幾乎都是）、75%（大部分是）、50%（大概一半）、25%（大部分不是）、0%（都不是或幾乎都不是），據此計算出 0 至 100 的鄰里互動值。由於該變項分布呈現明顯右偏，後續分析將鄰里互動值加 1 後取自然對數進行

4 參見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臺，2019，108 年行政區 15 歲以上人口五歲年齡組教育程度統計_鄉鎮市區。https://reurl.cc/5K5Rxn，取用日期：2025 年 3 月 25 日。

分析。

4. 社區參與

此變項用以捕捉社區參與程度。將題組 n23 「請問您過去 12 個月來有沒有參與下面這些社區活動」的八項活動加總，包含：運動或康樂休閒活動、志工服務、社區共餐或節慶、地方寺廟或教會活動、產銷組織（例如講習）、婦女團體的活動、村里民會議或公共會議，以及社區旅遊或進香團。

（三）控制變項

首先，性別常常展現不同的遷移樣態，尤其是女性的依附遷移；近年研究發現，男性與女性的遷移差異不必然出現在家庭層面，反而是男性相較女性更常因工作而遷移（Mulder and Malmberg 2014）。接著，生命歷程觀點認為，不同生命階段者在就業、伴侶及婚家、生育以及退休等面向上有不同考量，故本研究將**年齡**分成六組。由於出生並仍居住於當地者，其特質可能與外移居民有所不同，本研究比較受訪者現居地與其 15 歲前的成長地及出生地，據此建立「本地人」與否的分類。我們也進一步藉由父親族群背景，建構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與其他五類，控制**族群**效果。

考量遷移往往與家庭有關，本文將**婚姻狀態**分為：單身未婚、初次結婚與同居、已婚未同住，與離婚／分居／喪偶；同時納入是否與**高齡者**（65 歲以上）或**兒童**（6 歲以下）同住，做為家庭結構的控制變項。另外，財富狀態也與遷移有關。個人或家庭有**自住宅**，往往有助於促進留居意願，意味個人願意留下而置產，或是在經濟困頓時有地方可去。而家庭經濟狀況的好壞及變化，也有類似效果，於是本文控制兩種變項，其一是家庭的**收入**

適足性，0 至 4 的數值越大，表示越能應付日常開銷；其二是家庭經濟狀況近五年的變化，分為變好、差不多、變差三類。

考量空間脈絡可能影響留居意願，本研究控制區域層次的變項。首先，鑑於本文所採理論涉及鄉鎮與社區兩個層次的社經條件，我們控制受訪者主觀評估其居住鄉鎮與社區過去五年之經濟變化。其次，居住區域的整體社經狀況與人口規模，亦可能影響個人對地方發展前景的認識，進而影響留居意願。本文據此參考《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中所界定的「優先推動地區」——即依人口變化率、人口規模與居民收入等指標，挑選的政策干預重點地區——將受訪者的居住地分為「非創生區域」、「農山漁村」、「原鄉」與「中介城鎮」四類。最後，亦控制六大地理區（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與宜花東外島），以控制都市區位與政策資源對留居意願的潛在影響。

（四）分析策略

本研究採用線性迴歸模型，並搭配逐步迴歸法進行分析。分析時設定資料庫內建的加權數值，並採取 Stata 內建的 regress 模型中的 robust 選項。自變項方面，社會地位是類別變項；而地位同質性、社區參與和鄰里網絡皆是連續變項。由於依變項採多題項加總而成，刪除回答為「不一定」與「不知道」的樣本；其餘變項若有遺漏值者，亦不納入後續分析。

本研究最終將分析樣本限定為 25 歲以上，樣本數為 2,419 筆。此設定是基於兩項考量：(1) 本研究以個人教育程度在鄉鎮層級中的相對位置（脈絡地位）做為社會地位指標，考量到年輕族群的教育可能尚未完成，故排除可能仍處於求學階段之青年樣本；(2) 25 歲亦為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臺所採用之年齡分組的起

點之一（如 15-19 歲、20-24 歲、25-29 歲等），此分組方式有助於提升本研究與官方統計資料在操作上的一致性，亦有助於後續估算教育的相對位置。

四、分析結果

（一）描述統計

本研究的描述統計如表 1 所示，僅納入 25 歲以上且無遺漏值的樣本，最終有效觀察值為 2,419 筆。以下呈現加權後的平均數、標準差與比例分布，以掌握整體樣本的基本輪廓。首先，依變項「留居意願」的平均值是 7.78，標準差為 1.39；由於最大值係 12，顯示整體分布偏高，反映多數受訪者對於留居當地持正面態度。

自變項部分，社會地位以受訪者在其世代與居住區域內的教育相對位置做為衡量標準，分為四個等級。社會地位以 PR 區間區分，其中 25-49.9 百分位的比例最高（29.70%），而 75-99.9 百分位者比例最低（19.72%），顯示教育程度經過世代與區域換算後仍具異質性。地位同質性則反映受訪者是否屬於其居住地中的多數群體，平均值為 0.33（標準差為 0.13），範圍介於 0.08 至 0.57 之間，顯示樣本中涵蓋地位主流與非主流者。

接下來說明兩項與地方互動相關的變項描述統計。鄰里網絡由每日接觸人數與其中屬於鄰居者比例乘積而得，原始變項的平均數是 10.18，標準差是 12.32。由於分布偏態，採自然對數轉換後再納入迴歸模型，平均數為 1.89，標準差為 1.10，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4.62，顯示鄰里網絡在樣本中具有高度差異性。社

區參與反映受訪者參與地方活動的數量，平均參與數為 0.92（標準差為 1.21），顯示多數人參與度偏低，但仍有部分受訪者積極投入社區事務。

控制變項方面，樣本年齡結構偏高，以 55 至 64 歲者比例最高（24.76%），其次為 65 至 74 歲（15.96%）與 75 歲以上（4.25%）。性別方面，女性略少於男性，占 48.45%。多數受訪者為「本地人」，即出生與成長皆在現居地（60.97%）。在族群構成上，受訪者以閩南族群為主（75.72%），其次為客家族群（14.23%）。

家庭狀態方面，過半數受訪者與配偶或伴侶同住（53.95%）。另有 15.35% 的受訪者與學齡前兒童同住，19.27% 與高齡者同住。居住型態上，自有住宅比例逾八成，顯示其為農村主要居住形式。多數人認為近五年經濟狀況「差不多」（64.45%），對整體社區經濟變化的主觀感受也以「差不多」為主（63.54%），顯示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沒有太大變化。

最後，樣本主要集中於中彰投（31.13%）與雲嘉南（26.97%）地區。依地方創生區域分類，58.31% 的受訪者居住於非創生區域，其餘則分布於農山漁村、中介城鎮與原鄉地區。

表 1：描述統計

變項	平均數／百分比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留居意願	7.78	1.39	0.00	12.00
社區參與	0.92	1.21	0.00	8.00
鄰里網絡	10.18	12.32	0	100
鄰里網絡（取對數）	1.89	1.10	0.00	4.62
地位同質性	0.33	0.13	0.08	0.57
家戶適足性	1.92	0.88	0.00	4.00
社會地位				
PR 0-24.9	25.60			
PR 25-49.9	29.70			
PR 50-74.9	24.98			
PR 75-99.9	19.72			
性別（女性）	48.45			
年齡				
25-34	17.56			
35-44	19.83			
45-54	17.64			
55-64	24.76			
65-74	15.96			
75+	4.25			
遷移狀態（本地人）	60.97			
族群				
閩南	75.72			
客家	14.23			
外省	3.46			
原住民	4.43			
其他	2.15			
婚姻狀態				
單身未婚	19.56			
與配偶或伴侶同居	53.95			
已婚未同住	7.10			
離婚／分居／喪偶	19.39			
與兒童同住（有）	15.35			

續上頁表 1

變項	平均數／百分比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與高齡者同住（有）	19.27			
自住宅（有）	83.36			
家庭經濟狀況				
變好	16.08			
差不多	64.45			
變差	19.47			
鄉鎮經濟狀況				
變好	23.07			
差不多	57.62			
變差	19.31			
社區經濟狀況				
變好	18.72			
差不多	63.54			
變差	17.74			
地方創生區域				
非創生區域	58.31			
農山漁村	15.41			
中介城鎮	17.63			
原鄉	8.65			
地理區				
北北基	2.66			
桃竹苗	16.71			
中彰投	31.13			
雲嘉南	26.97			
高高屏	14.42			
宜花東外島	8.10			
樣本總數	2,419			

註1：報表數字均按照資料庫內建的加權數值轉換。連續變項呈現平均數、標準差、最小值與最大值；類別變項僅呈現百分比。樣本數為2,419。

註2：本論文使用資料部分係採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之《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分項一計畫》第1期第1次計畫，該計畫係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

(二) 迴歸分析

表 2 呈現控制變項與主要自變項對留居意願的統計估計。我們共建構四組模型，依序納入控制變項、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以及與社會互動相關的社區參與和鄰里網絡。由於模型 1 估計控制變項對依變項的關係與效果，故不贅言。大多數結果符合既有文獻，遷移意願與個人社會人口特徵（如性別、族群、遷移狀態與生命階段）及地區特徵（地方經濟變化與區域類型）密切相關。

首先，模型 1 至 2 的調整後 R^2 從 0.1472 提升至 0.1601，BIC 從 10050.56 下降至 10040.93，顯示社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釋留居意願的變化。分析結果則支持假設 1A，也就是在農村區域的社會地位越高，留居意願越低。地位次高的群體（PR50-74.9）相較地位次低（PR25-49.9）的參照組，留居意願並無顯著差異，然而最低地位（PR0-24.9）呈現最高的留居意願（係數 0.319， p 值小於 0.01），而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最低（係數 -0.420， p 值小於 0.001）。亦即，社會地位越高的農村居民，越可能傾向追求生活品質或社會流動機會，進而表現出較低的留居傾向；此結果不同於假設 1B 所預期的「高地位者因在社區中更自在而提高留居意願」。

此外，地位同質性對留居意願並無顯著影響，假設 2 未獲支持。換言之，農村居民的留居意願不直接受到居住區域的地位同質性影響。結合文獻討論與假設 4A 和 4B 的競爭性觀點，這一結果可能顯示，地位同質性對留居意願的影響受到社會地位調節。此一關係將於模型 4 中進一步檢驗。

接著，模型 3 納入兩個社會互動變項——社區參與和鄰里網絡。從模型 2 到模型 3，調整後 R^2 提升至 0.1856，BIC 則降至

9979.78，整體配適度略有改善。就結果來說，模型 3 支持假設 3，即兩項社會互動指標皆與留居意願呈正相關。社區參與程度的係數為 0.164，取對數後的鄰里網絡係數為 0.194，兩者皆達統計顯著（ p 值小於 0.001）。此外，在模型 3 中，社會地位對留居意願的影響仍顯著，支持假設 1A。⁵

前述結果指出兩項發現：第一，社會互動的確有助於解釋居民的留居意願，呼應 D'Ingiullo 等人（2023）及 Lee 與 Lee（2019）的研究結論。第二，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以及社區參與和鄰里網絡兩組概念，在統計上呈現相對獨立的效果。

整體而言，分析結果支持假設 1A 與假設 3，亦即：社會地位越高者的留居意願越低，而社區參與和鄰里網絡越活絡者，其留居傾向越強。為進一步探討不同社會地位者是否透過不同的居住背景與互動途徑調整其留居意願，本文檢視了社會地位分別與地位同質性（假設 4A 與 4B）、社區參與（假設 5），以及鄰里網絡（假設 6）的三組交互作用。表 3 中的模型 4 至 6 是交互作用模型；然而，交互作用模型涉及類別與連續變項，僅依 p 值難以準確判讀效果，故輔以邊際效應圖與信賴區間加以視覺化呈現。

模型 4 納入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的交互作用項。結果顯示，在地位同質性為 0 時，各地位組與參照組在留居意願上皆無顯著差異；然而，地位同質性對整體留居意願呈現負向影響（係數為 -1.17， p 值小於 0.05）。搭配圖 1 解釋，分析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假設 4B。最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隨地位同質性增加而顯著提升（係數為 2.707， p 值小於 0.01）。具體而言，當區域內的地位同質性達 30% 時，最低地位組的線性預測值約為 8.5；提升至 50% 時則上升至約 8.7，顯示其留居意願明顯高於其他組別。

5 本文亦針對模型 3 進行變異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分析，平均 VIF 為 2.35，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之 VIF 亦皆低於 2，模型中未見顯著多重共線性問題。

此外，與假設 4A 相反，當地位同質性達到 30% 時，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顯著低於次高與次低組，從邊際效應圖中可見其信賴區間未與其他組重疊。次高與次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則未隨地位同質性改變而有顯著變化。

綜合來看，結果顯示，僅最低地位組在高地位同質性環境下表現出較強的留居意願，這可能是因為較低的同質性削弱其安全感，或降低其獲取資源和情感支持的機會。此外，與假設 4A 相左，資料顯示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與地位同質性呈反向關係，亦即「同類相吸」的效果有其限制；高地位居民可能也不願居住在社會地位普遍更高的社區（Galster and Turner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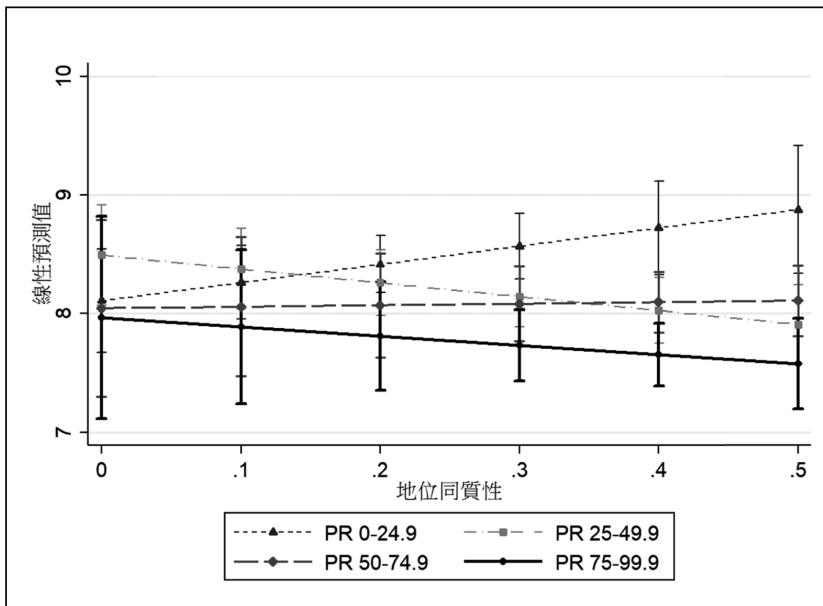


圖 1：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的交互作用

模型 5 與圖 2 分析呈現了社會地位與社區參與之間的交互作用。雖然交互作用項未達顯著水準，但圖 2 顯示，社區參與

有助於縮小最低地位組與其他地位組之間的留居意願差距。在模型 5 中，當社區參與為 0 時，最低地位組留居意願顯著較高（係數為 0.415， p 值小於 0.01），而最高地位組則顯著偏低（係數為 -0.473， p 值小於 0.001）。社區參與和留居意願呈正相關（係數為 0.177， p 值小於 0.001），但其與社會地位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圖 2 顯示，最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對社區參與變動較不敏感，其他三組地位者的留居意願則隨社區參與增加而顯著提升。當參與達 2 次時，次低與次高地位組的信賴區間上限已涵蓋參照組的估計點，顯示三者間差異不具統計顯著性；參與達 4 次時，最高地位組亦呈現相同情形，其信賴區間上限已涵蓋參照組估計點，表示組間差異趨於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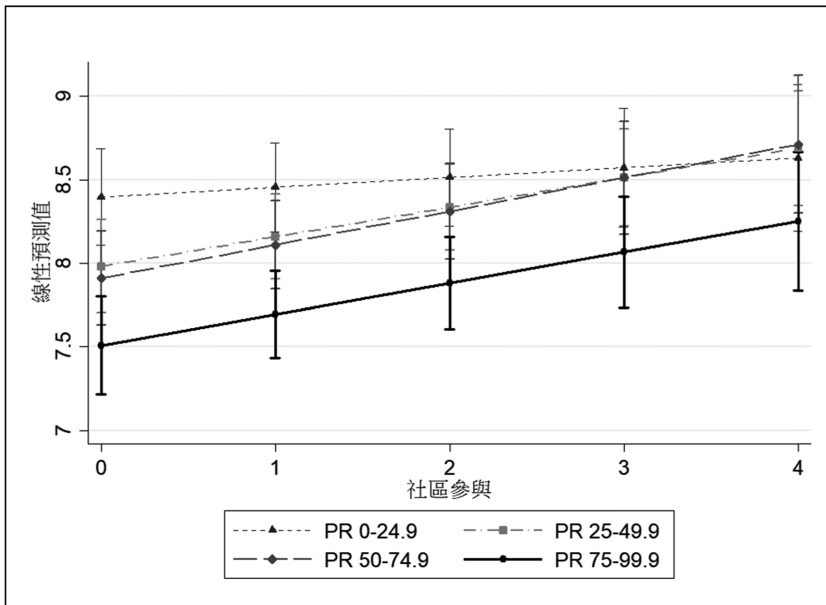


圖 2：社會地位與社區參與的交互作用

整體而言，模型 5 雖無法明確支持假設 5，惟結果顯示社區參與有助於縮小高低地位群體間的留居意願差距。社區參與程度

越高，除提升高地位者留居傾向外，亦對次高與次低地位群體產生類似的正向效果。這或許也反映出，次低地位群體在參與社區時，懷抱著與最低地位群體不同的訴求。該群體或許透過公共參與展現能力與責任感，藉此爭取社區認可與社會肯定，進而提升留居意願。

最後，模型 6 及圖 3 呈現了社會地位與鄰里網絡的交互作用。與假設 6 的預期相異，鄰里網絡對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提升效果最為顯著。在模型 6 中，當鄰里網絡為 0，最低地位組與參照組之間的顯著差異消失，而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則有所下降（從模型 3 的 -0.463， p 值小於 0.001，降為模型 6 的 -0.946， p 值小於 0.001）。此外，鄰里網絡對所有居民的留居意願，均呈現出接近顯著的正向影響（係數為 0.120， p 值小於 0.1）。

圖 3 進一步呈現各地位組在不同鄰里網絡水準下的留居意願變化。當鄰里網絡的對數值達到 2（相當於約 7 人），最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顯著高於次高和次低地位組，並隨著鄰里網絡的增加而持續上升，與次高、次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差距越來越大（係數為 0.191， p 值小於 0.1）。另一方面，當鄰里網絡的對數值達 3 時，最高地位組的估計點與信賴區間皆已涵蓋次高與次低地位組的估計點，顯示三者之間的差異不再具有統計顯著性（係數為 0.248， p 值小於 0.05）。

整體來看，隨著鄰里網絡的提升，原本最高與最低地位組之間的留居意願落差逐漸縮小，呈現出鄰里網絡具有收斂而非擴散地位差異的趨勢。換句話說，原先的**假設 6 只被部分支持**，低地位群體隨著鄰里網絡增加，留居意願的上升幅度只高過了次高與次低地位組。這可以從理論上解釋為，低地位群體的確「**依賴**」親友所提供的經濟支持和照顧，以及緊密的社會網絡，形成了重

要的安全感，從而增加留居意願。

然而，最高地位群體在鄰里網絡密度較高時也呈現出更強的留居意願，顯示高地位者的鄰里關係並非「選擇性歸屬感」所假設的那樣，僅是維持表面或疏離的關係。這或許也意味著，當高地位者在社區中建立起穩定且密切的鄰里關係時，也反映出他們逐漸調整對地方的期望，並適應當地的人文和社會環境，從而進一步提升留居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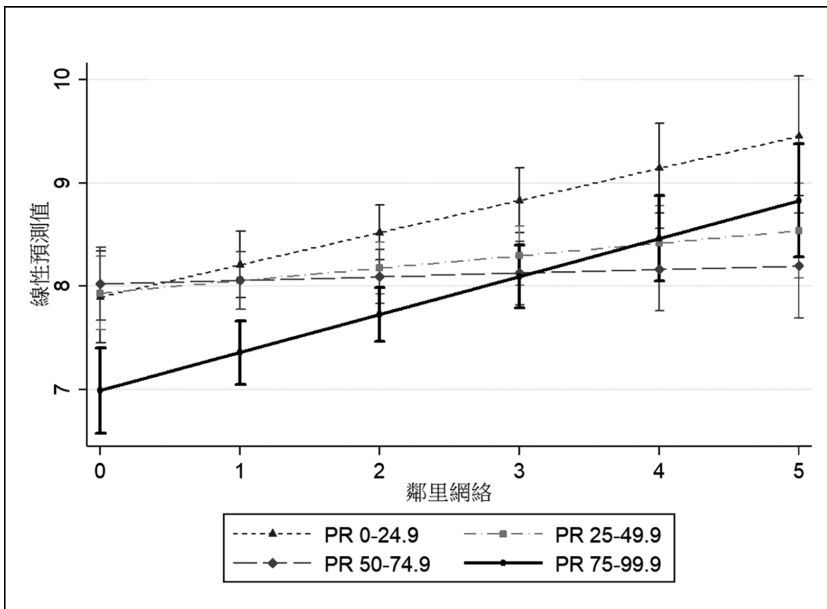


圖 3：社會地位與鄰里網絡的交互作用

表 2：線性迴歸模型——社會地位及社會互動對留居意願的估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控制變項		納入社會地位		納入社會互動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依變項 (留居意願)						
社會地位 (參照組 = PR 25-49.9)						
PR 0-24.9			0.319**	(0.118)	0.323**	(0.116)
PR 50-74.9			-0.04	(0.120)	0.056	(0.118)
PR 75-99.9			-0.420***	(0.121)	0.463***	(0.118)
地位同質性			-0.127	(0.407)	0.052	(0.404)
社區參與					0.164***	(0.028)
鄰里網絡 (取對數)					0.194***	(0.039)
女性 (參照組 = 男性)	-0.043	(0.087)	-0.098	(0.087)	0.119	(0.086)
年齡 (參照組 = 25-34)						
35-44	0.193	(0.158)	0.279+	(0.158)	0.233	(0.157)
45-54	0.567***	(0.164)	0.626***	(0.162)	0.540***	(0.161)
55-64	0.930***	(0.158)	0.976***	(0.157)	0.775***	(0.157)
65-74	1.435***	(0.169)	1.573***	(0.179)	1.351***	(0.178)
75+	1.838***	(0.183)	1.847***	(0.190)	1.649***	(0.187)
本地人 (參照組 = 非本地人)	0.618***	(0.095)	0.588***	(0.094)	0.513***	(0.093)
族群 (參照組 = 閩南)						
客家	-0.016	(0.117)	-0.027	(0.118)	0.033	(0.118)

續上頁表 2

外省	-0.421+	(0.218)	-0.307	(0.223)	0.241	(0.231)
原住民	0.535*	(0.265)	0.487+	(0.261)	0.436+	(0.265)
其他	0.349	(0.277)	0.156	(0.283)	0.197	(0.272)
婚姻狀態 (參照組 = 單身未婚)						
與配偶或伴侶同居	0.429**	(0.136)	0.396**	(0.133)	0.280*	(0.132)
已婚未同住	0.112	(0.179)	0.124	(0.177)	0.085	(0.176)
離婚/分居/喪偶	0.176	(0.154)	0.098	(0.152)	0.054	(0.150)
與高齡者同住 (參照組 = 無)	0.045	(0.112)	0.065	(0.113)	0.045	(0.111)
與兒童同住 (參照組 = 無)	0.033	(0.125)	0.041	(0.124)	0.058	(0.122)
自住宅 (參照組 = 無)	0.357**	(0.123)	0.373**	(0.121)	0.358**	(0.120)
家庭適足性	0.119*	(0.051)	0.174***	(0.052)	0.145**	(0.051)
家庭經濟狀況 (參照組 = 差不多)						
變好	0.326*	(0.129)	0.369**	(0.129)	0.368**	(0.129)
變差	-0.082	(0.119)	-0.094	(0.117)	0.098	(0.116)
鄉鎮經濟狀況 (參照組 = 差不多)						
變好	0.307*	(0.136)	0.311*	(0.136)	0.322*	(0.132)
變差	0.194	(0.165)	0.182	(0.161)	0.195	(0.158)
社區經濟狀況 (參照組 = 差不多)						
變好	0.162	(0.143)	0.145	(0.142)	0.094	(0.140)

續上頁表 2

變差	-0.177	(0.175)	-0.178	(0.171)	0.203	(0.167)
地方創生區域 (參照組 = 非創生區域)						
農山漁村	0.300*	(0.121)	0.296*	(0.122)	0.218+	(0.119)
中介城鎮	0.119	(0.129)	0.117	(0.127)	0.084	(0.126)
原鄉	0.659***	(0.183)	0.701***	(0.182)	0.582**	(0.184)
地理區 (參照組 = 北北基)						
桃竹苗	-0.512+	(0.287)	-0.487+	(0.289)	0.452	(0.280)
中彰投	-0.593*	(0.280)	-0.558*	(0.282)	0.450+	(0.272)
雲嘉南	-0.362	(0.277)	-0.347	(0.278)	0.285	(0.267)
高屏	-0.523+	(0.291)	-0.497+	(0.292)	0.405	(0.282)
宜花東外島	-0.334	(0.332)	-0.398	(0.330)	0.295	(0.320)
Constant	6.117***	(0.335)	6.046***	(0.364)	5.784***	(0.352)
Observations	2419		2419		2419	
R^2	0.1585		0.1726		0.1984	
Adjusted R^2	0.1472		0.1601		0.1856	
BIC	10050.56		10040.93		9979.78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線性迴歸模型——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及社會互動的交互作用效果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的交互作用			社會地位與社區參與的交互作用			社會地位與鄰里網絡的交互作用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依變項 (留居高願)									
社會地位 (參照組 = PR 25-49.9)									
PR 0-24.9	-0.386	(0.260)	0.415**	(0.143)	-0.038	(0.248)			
PR 50-74.9	-0.448	(0.403)	-0.071	(0.137)	0.087	(0.211)			
PR 75-99.9	-0.529	(0.491)	-0.473***	(0.142)	-0.946***	(0.235)			
地位同質性	-1.170*	(0.573)	-0.090	(0.403)	-0.029	(0.406)			
社區參與	0.165***	(0.027)	0.177***	(0.045)	0.163***	(0.028)			
鄰里網絡 (取對數)	0.194***	(0.039)	0.195***	(0.039)	0.120+	(0.064)			
社會地位 × 地位同質性									
PR 0-24.9 × 地位同質性	2.707**	(0.993)							
PR 50-74.9 × 地位同質性	1.296	(0.998)							
PR 75-99.9 × 地位同質性	0.393	(1.307)							
社會地位 × 社區參與									
PR 0-24.9 × 社區參與			-0.119	(0.073)					
PR 50-74.9 × 社區參與			0.024	(0.069)					
PR 75-99.9 × 社區參與			0.009	(0.073)					

續上頁表 3

社會地位 × 鄰里網絡 (取對數)			
PR 0-24.9 × 鄰里網絡	0.191+	(0.108)	
PR 50-74.9 × 鄰里網絡	-0.085	(0.093)	
PR 75-99.9 × 鄰里網絡	0.248*	(0.103)	
女性 (參照組 = 男性)	-0.111	(0.086)	
年齡 (參照組 = 25-34)			
35-44	0.377*	(0.162)	0.247
45-54	0.672***	(0.170)	0.561***
55-64	0.840***	(0.167)	0.787***
65-74	1.368***	(0.184)	1.356***
75+	1.686***	(0.192)	1.667***
本地人 (參照組 = 非本地人)	0.515***	(0.093)	0.513***
族群 (參照組 = 閩南)			
客家	0.031	(0.119)	0.029
外省	-0.234	(0.228)	-0.245
原住民	0.449+	(0.257)	0.429
其他	0.162	(0.274)	0.164
婚姻狀態 (參照組 = 單身未婚)			
與配偶或伴侶同居	0.285*	(0.131)	0.272*
	0.289*	(0.132)	

續上頁表 3

已婚未同住	0.072	(0.176)	0.078	(0.176)	0.071	(0.175)
離婚/分居/喪偶	0.063	(0.150)	0.045	(0.150)	0.058	(0.151)
與高齡者同住 (參照組=無)	0.041	(0.111)	0.035	(0.111)	0.040	(0.111)
與兒童同住 (參照組=無)	0.027	(0.122)	0.058	(0.122)	0.058	(0.121)
自住宅 (參照組=無)	0.362**	(0.119)	0.363**	(0.119)	0.346**	(0.120)
家戶適足性	0.142**	(0.051)	0.146**	(0.052)	0.147**	(0.051)
家庭經濟狀況 (參照組=差不多)						
變好	0.359**	(0.128)	0.370**	(0.129)	0.367**	(0.129)
變差	-0.108	(0.115)	-0.096	(0.116)	-0.107	(0.116)
鄉鎮經濟狀況 (參照組=差不多)						
變好	0.317*	(0.132)	0.320*	(0.132)	0.334*	(0.131)
變差	0.203	(0.157)	0.188	(0.158)	0.189	(0.158)
社區經濟狀況 (參照組=差不多)						
變好	0.095	(0.139)	0.087	(0.140)	0.091	(0.140)
變差	-0.216	(0.167)	-0.205	(0.167)	-0.194	(0.167)
地方創生區域 (參照組=非創生區域)						
農山漁村	0.201+	(0.119)	0.215+	(0.118)	0.202+	(0.119)
中介城鎮	0.067	(0.126)	0.083	(0.126)	0.098	(0.125)
原鄉	0.560**	(0.182)	0.580**	(0.183)	0.590**	(0.186)

續上頁表 3

地理區 (參照組=北北基)							
桃竹苗	-0.467 +	(0.277)	-0.445	(0.279)	-0.456	(0.279)	
中彰投	-0.486 +	(0.268)	-0.441	(0.272)	-0.446 +	(0.270)	
雲嘉南	-0.334	(0.265)	-0.272	(0.267)	-0.275	(0.265)	
高高屏	-0.427	(0.279)	-0.402	(0.281)	-0.397	(0.280)	
宜花東外島	-0.335	(0.316)	-0.292	(0.320)	-0.324	(0.320)	
Constant	6.090***	(0.375)	5.765***	(0.358)	5.913***	(0.378)	
Observations	2419		2419		2419		
R ²	0.2020		0.1996		0.2037		
Adjusted R ²	0.1883		0.1858		0.1900		
BIC	9992.14		9999.44		9987.0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藉由《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第一期一般問卷資料，描繪出臺灣農村居民留居意願的輪廓，填補近年農村遷移研究的空白。當研究焦點從「實際遷移」轉向「遷移意願」，我們更強調，留在農村並不僅是「未能離開」的被動結果，也可能是根植於地方關係中的協商與選擇（Carling and Schewel 2018; Schewel 2020）。

本文的理論架構聚焦於個人如何根據其社會位置，透過與地方的互動經驗，發展出不同的留居意願，並嘗試平衡「社會流動」的動力與「地方關係」的黏著性，理解社會地位差異所形成的留居途徑。研究發現，社會地位對留居意願具有解釋力。高地位者更傾向於離開農村，而低地位者則較傾向留下；隨著地位提升，人們更偏好透過遷移來取得或維持社會地位（**支持假設 1A**），較高地位者並未因享有社區認可或生活條件較佳而選擇留下（**不支持假設 1B**）。地位同質性並未呈現直接效果（**不支持假設 2**）；而社區參與及鄰里網絡，則皆與留居意願呈正相關（**支持假設 3**）。

本文亦嘗試推進理論的應用與轉譯，將過往質化研究中關於社會地位與地方互動的辯證關係，轉化為可量化檢驗的分析模型。研究發現，社會地位的確調節了地位同質性，以及社會互動對留居意願的影響。最低地位者不僅重視與相似背景者共處，也「**依賴**」鄰里網絡來建立安全感。當其所處社區的地位同質性越高，留居意願也隨之上升（**僅支持假設 4B**）；而鄰里網絡的密度越高，同樣能顯著提升其留居傾向（**部分支持假設 6**）。相對而言，高地位者透過社區參與建立地方連結的說法，並未獲得支持。社區參與對於最高、次高與次低地位者，皆有助於縮小其與

最低地位群體在留居意願上的差距（**不支持假設 5**）；鄰里網絡亦能增強高地位者的留居意願（**部分支持假設 6**）。

據此，本文提出兩個理論反思。其一，即便是中高乃至最高地位的群體，其流動性也可能「下修」：除了藉由參與社區活動，留居意願有所上升外（此趨勢亦出現在次低地位組），鄰里網絡對最高地位組的正向效果，甚至高於最低地位組。當高地位者在社區中建立了穩定的日常連結，也可能逐步調整對地方的期待與定位，進而提升留居意願。這顯示，鄰里關係做為一種非正式的社會連結，其對高地位群體的影響，可能被選擇性歸屬感的論點低估了。

其二，本文也梳理了低地位群體內部的異質性。我們發現，最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並非絕對穩定，而是可能隨著地位同質性降低、鄰里支持較弱而下降。換言之，即便是常被視為「不遷移」的群體，也應進一步理解其留居意願，以此理解他們是缺乏能力（非自願不流動），或是自願留下（自願不流動）（Carling and Schewel 2018; Schewel 2020）。進一步而言，「留下」並非靜態的決定，而是鑲嵌在地方社會—情感關係中的動態衡量。

本研究亦面臨資料與方法上的限制，這些限制同時指出了未來研究的方向。首先，本研究以受訪者在同區域、同世代中的教育相對位置做為社會地位的指標，旨在突顯地位並非絕對標準，而是建構於特定脈絡中的相對衡量，藉此掌握個人在地方生活中可能經驗到的「相對剝奪感」與「地位錯置」現象。然而，此一作法亦存在若干限制。教育雖為常用的社會地位指標，卻難以涵蓋收入、職業或財產等多重面向，可能因此低估群體間潛在的階層差異。特別是在強調地方脈絡的分析框架中，若要更精確評估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仍需仰賴涵蓋不同空間尺度（如村里或鄉鎮層級）的家戶所得資料，或標準化職業分類。惟目前可得

資料在此方面尚屬有限，未來研究在資料蒐集與建置上的進一步突破，將有助於更細緻地描繪地方層次的社會地位樣貌。

其次，針對部分結果未符合「選擇性歸屬感」理論的預期——例如，社區參與對留居意願的正向效果，不僅出現在低地位群體，也同樣作用於次低、次高乃至最高地位者——我們尚難判定此結果是否反映歐美質性研究的理論局限，例如過度強調高地位者與其他居民在參與經驗上的隔閡。未來的分析策略，或可從「參與程度（量）」的測量，轉向更細緻地掌握「參與形式（質）」的差異。諸如：在都市與農村社區，都觀察到中產階級家長透過教育參與，建立了與地方的關係（Haartsen and Stockdale 2018; Savage et al. 2004）。Cloke 等人（1995）則從遷移狀態與社區參與之目的，建構了鄉村高地位者的類型學。透過質化或進一步的量化設計，釐清不同類型的參與活動，與社區組織所承載的文化認同實踐與權力資源配置，將有助於理解社區參與在不同社會地位群體中的意義及作用。

第三，若欲更進一步建構留居意願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亦可引入「意願—實踐」的雙階段遷移模型（Carling and Schewel 2018），然而這有賴於長期追蹤資料。此途徑可檢視高地位者是否因社會互動日益密集而改變其遷移傾向，最終「想留下，也留下」；亦可分析低地位者是否因資源匱乏與熟悉網絡的解組，反而處於「不想留下，卻仍留下」的矛盾處境。

第四，長期資料也有助於處理內生性問題，進一步釐清社會互動對留居意願的效果。舉例來說，個人是否因原本就計畫長期留居，才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抑或原本只是偶然的參與經驗，卻在互動過程中意外產生了對地方的情感連結與依附？釐清這些機制，有助於後續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的進展。

本文聚焦不同地位者發展地方關係的路徑，也與臺灣農村地景的變化有所呼應。整體而言，臺灣對農村居民之間因社會地位差異所產生的互動型態，至今尚缺乏系統性探討。然而，農村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研究已開始關注中產階級或高地位者進入農村的現象，並關注他們與原有居民——特別是社會地位相對較低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國外經驗中，這樣的現象常讓學者警覺社會不平等是否發生，特別是高地位群體如何透過論述與文化符碼的運用，重塑且控制地方秩序（Shucksmith 2012）。

臺灣研究尚未對農村仕紳化導致的階級結果有一致的結論。不同地位的新舊居民之間的「社會隔閡」（李承嘉等 2010；王文誠、李崇恩 2018；廖淑容 2013），以及移居者積極發展「地方連結」（張凱智、賴昱年 2022），兩種現象並存。那麼，鄉村的中高地位移居者是否排擠了低地位者，瓦解其所依賴的人際與情感網絡？有論者認為農村的中產階級雖然增多，但並未出現明顯的「階級替代」現象（王文誠、李崇恩 2018）。當前的農村地景，更接近階級的混合與拼貼——不同群體並存，而非相互取代。

基於上述討論，本文提出兩項政策建議。與其將「回流」視為理所當然的政策目標，本文主張應正視「選擇留下」的心願，及其所依賴的社會條件與脈絡。首先，應關注農村低地位者的日常生活處境，並適時提供正式與非正式的支持。研究發現，當低地位者處於地位異質的社區，或鄰里網絡瓦解時，留居意願將降低。雖然臺灣農村目前尚未出現明顯的階級取代現象，但低地位者所依賴的社會連結，還是可能因親友遷出或凋零而瓦解。因此，國家與地方政府應透過建立替代性的支持機制，降低社區變遷帶來的不安全感，進而維繫其留居意願與福祉。

其二，政策規劃除了強調透過創業或就業創造勞動遷移的機會軌道外，藉由深化不同社會地位者——特別是高地位移居

者——與在地社群的網絡連結，減少社會遷出，也同樣重要。近年的「地方創生」政策，其核心思維仍是以經濟及就業機會促進島內人口平衡。⁶可是，遷入不代表留下，移居鄉村會遭遇許多與期望不符的調適過程（Halfacree and Rivera 2012）。

本文的分析顯示，無論社會地位高低，居民皆能透過緊密的社會網絡與社區互動，提升留居意願。實際上，張凱智與賴昱年（2022）針對花蓮新居者的研究，就提出該建立移居者與在地居民的互動網絡；陶維均與楊富民（2020）二人與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的實作經驗，也旨在促進移居者與在地居民相互融入。鑑此，未來的《地方創生》政策規劃與評估，或可進一步納入促進異質群體——包括不同社會地位與遷移經驗者——彼此認識與互動的社會指標，並將其視為社會整合及促進永續的政策目標。

總結來說，本文嘗試突破傳統遷移研究以「實踐」為中心的視角，轉而關注「留居意願」的形成歷程與背景，並強調這種意願並非靜態的結果，更含括人—地之間的動態互動所形成的社會—情感關係，進而提出將「留下」視為選擇與協商的理論框架。國家若要試圖回應人口外移危機，除了透過經濟手段外，促進居民間彼此的社會互動，亦是可採取的措施。進一步而言，當部分鄉村居民面對人口外移的挑戰時仍選擇留下，將視角挪移至居民之所以願意留下的社會脈絡及基礎，亦有助於將鄉村視為由人們選擇、維繫與再造的生活場域。

6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1）將政策手段放在「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產業，讓人口回流，青年返鄉，解決人口變化，積極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後續提出的《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0：3）則希望「……110 至 114 年……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推動 80 項地方創生事業、吸引 125 位青年留鄉或返鄉……5 年內推動 400 項地方創生事業、吸引至少 500 位種子青年留鄉或返鄉……」。

作者簡介

陳祈璋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遷移與（不）流動研究、鄉村社會學，以及地方依附。博士論文聚焦臺灣鄉村留居者與返鄉者，透過生命歷程觀點，探討遷移的意義、規範與價值如何隨社會與空間變遷而轉型。

顏詩耕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國內人口遷移與居住流動、教育不平等。目前主要關注臺灣國內遷移者的選擇性趨勢和變遷，以及都市居住區隔程度的變化和機制。

參考書目

- 王千岳、邱冠璋，2023，〈臺灣人口遷移因素之研究：來自空間縱橫模型之證據〉。《地理學報》106: 61-78。
- 王文誠、李崇恩，2018，〈從「仕紳化」到「仕紳化想像」：員山鄉七賢村的個案研究〉。《臺灣土地研究》21(1): 23-59。
- 王怡雯、張政亮，2006，〈生活環境滿意度與人口遷移關係之研究——以台南市為例〉。《北市教大社教學報》5: 33-52。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提要分析》。
<https://reurl.cc/8Do9V4>，取用日期：2025年4月1日。
- 李承嘉、戴政新、廖麗敏、廖本全、林欣雨，2010，〈鄉村仕紳化——以宜蘭縣三星鄉三個村為例〉。《臺灣土地研究》13(2): 101-147。
- 林季平、廖高禮，2011，〈臺灣失業勞工的遷徙及再就業：初級、回流、及連續遷徙分析〉。《人口學刊》42: 1-41。
- 施添福，1979，〈臺灣人口長成及其空間集中過程〉。《地理研究報告》5: 159-181。
- 洪嘉瑜、陶宏麟、蔡智發，2003，〈影響台灣內部遷徙的經濟因素探討〉。《經濟論文叢刊》31(2): 253-277。
- 洪嘉瑜、銀慶貞，2008，〈台灣人口遷移屬性與動機的變化〉。《東吳經濟商學學報》61: 31-65。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https://reurl.cc/9DGnmn>，取用日期：2025年4月5日。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https://reurl.cc/knEY8d>，取用日期：2025年4月5日。
- 張明正，1979，〈臺灣地區人口移動之選擇性〉。《人口學刊》3: 43-68。
- 張凱智、賴昱年，2022，〈來！去！後山過日子！——探索花、東地區生活風格移居者的價值意涵〉。《地理學報》102: 3-36。
- 張慈佳、胡海豐，2006，〈夢想的代價：區域間人口遷移決策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3): 417-441。
- 章英華，1994，〈遷徙意願與理想居住地：從都市化、個人背景與居住環境評價的探討〉。《中央研究院中山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3: 65-90。

- 陶維均、楊富民，2020，〈「移創指導所」——助移居創作者不只搬入，更融入〉。倡議家，<https://reurl.cc/qGNAKE>，取用日期：2025年4月3日。
- 葉晉嘉、張旭豐，2011，〈社經條件、價值傾向與青年人口潛在遷移意願研究〉。《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37: 69-95。
- 廖淑容，2013，〈農地別墅對客家聚落衝擊之研究：美濃在地住民看法〉。《建築與規劃學報》14(2-3): 109-130。
- 劉一龍，2012，〈臺灣區域人口遷徙的再分析：「遷移轉型」概念之運用〉。《人口學刊》45: 35-75。
- 蔡宏進，1979，〈臺灣都市化過程中都市與鄉村人口的再分配及變動：性質、問題及政策上的含義〉。《人口學刊》3: 1-42。
- 薛立敏、李中文、曾喜鵬，2003，〈台灣區域人口遷移及其與就業市場、住宅市場關係之實證研究〉。《都市與計劃》30(1): 37-62。
- 薛立敏、曾喜鵬、陳雅君，2002，〈區域人口遷入台北都會區地點選擇之實證研究〉。《住宅學報》11(2): 159-178。
- 薛立敏、曾喜鵬、謝鈺偉，2007，〈台灣地區近年來遷移行為變化之影響因素分析——家戶遷移決策與遷移地點選擇之聯合估計〉。《人口學刊》34: 69-107。
- 邊瑞芬，1991，〈台灣地區縣市社經發展與人口遷移的關係〉。《人口學刊》14: 83-108。
- Ackert, Elizabeth, Amy Spring, Kyle Crowder, and Scott J. South, 2019, "Kin Location and Racial Disparities in Exiting and Entering Poor Neighborhood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84: 1023-46.
- Adey, Peter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2013，〈移動：Mobility〉。臺北：群學。（Adey, Peter, 2009, *Mobility*. London: Routledge.）
- Aslany, Maryam, Jørgen Carling, Mathilde Bålsrud Mjelva, and Tone Sommerfelt, 2021, *Systematic Review of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Aspirations*. Southampton: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 Benson, Michaela and Emma Jackson, 2013, "Place-Making and Place Maintenance: Performativity, Place and Belonging among the Middle Classes." *Sociology* 47(4): 793-809.
- Benson, Michaela, 2014, "Trajectories of Middle-Class Belonging: The Dynamics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Classed Identities." *Urban Studies*

- 51(14): 3097-3112.
-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 Carling, Jørgen and Francis Collins, 2018, "Aspiration, Desire and Driver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4(6): 909-926.
- Carling, Jørgen and Kerilyn Schewel, 2018, "Revisiting Aspiration and 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4(6): 945-963.
- Carling, Jørgen, 2014, "The Role of Aspirations in Mi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September 23-25.
- Carr, Patrick J. and Maria J. Kefalas, 2009, *Hollowing Out the Middle: The Rural Brain Drain and What It Means for America*. Boston: Beacon.
- Clark, Shelley, Sam Harper, and Bruce Weber, 2022, "Growing Up in Rural America."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8(3): 1-47.
- Clark, William A. V., Ricardo Duque-Calvache, and Isabel Palomares-Linares, 2017, "Place Attachment and the Decision to Stay in the Neighbourhood."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3(2): e2001.
- Cloke, Paul, Martin Phillips, and Nigel Thrift, 1995, "The New Middle Class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s of Rural Living." Pp. 220-238 in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es*, edited by Tim Butler and Michael Savage. London: UCL.
- Coulter, Rory, Maarten van Ham, and Allan M. Findlay, 2016, "Re-Thinking Residential Mobility: Linking Live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0(3): 352-374.
- Cuervo, Hernán and Johanna Wyn, 2017,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Belonging: Temporal, Performative and Relational Practices by Young People in Rural Australia." *Young* 25(3): 219-234.
- D'Ingiullo, Dario, Iacopo Odoardi, and Davide Quaglione, 2023, "Stay or Emigrate? How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s Selective Migration in Italy."

-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10(1): 529-548.
- David, Quentin, Alexandre Janiak, and Etienne Wasmer, 2010, "Local Social Capital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8(2): 191-204.
- Fabiansson, Charlotte, 2015, "Young People's Societal Belonging and Perception of Social Status within Networks." *Rural Society* 24(1): 85-105.
- Farrugia, David, 2020, "Class, Place and Mobility beyond the Global City: Stigmatisation and the Cosmopolitanisation of the Local."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3(2): 237-251.
- Folkes, Louise, 2022, "Re-Imagining Social Mobility: The Role of Relationality, Social Class and Place in Qualitative Constructions of Mobility."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7(1): 136-153.
- Galster, George and Lena Magnusson Turner, 2017, "Status Discrepancy as a Driver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Evidence from Oslo."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9(9): 2155-2175.
- Galster, George, and Lena Magnusson Turner, 2019, "Status Aversion, Attraction and Discrepancy as Drivers of Neighborhood Selection." *City and Community* 18(3): 937-964.
- Gieling, Joost and Tialda Haartsen, 2017, "Liveable Villa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eering and Liveability in the Percep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Sociologia Ruralis* 57(S1): 576-597.
- Gieling, Joost, Tialda Haartsen, and Lotte Vermeij, 2019, "Village Facilities and Social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Rural Netherlands." *Rural Sociology* 84(1): 66-92.
- Haartsen, Tialda and Aileen Stockdale, 2018, "S/Elective Belonging: How Rural Newcome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Become Stayer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4(4): e2137.
- Halfacree, Keith H. and María Jesús Rivera, 2012,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 and Staying: Lives beyond Representations." *Sociologia Ruralis* 52(1): 92-114.
- Hedman, Lina, Maarten van Ham, and David Manley, 2011, "Neighbourhood Choice and Neighbourhood Reproduction."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3(6): 1381-1399.
- Hospers, Gert-Jan and Josefina Syssner, 2018, *Dealing with Urban and Rural Shrinkage: Formal and Informal Strategies*. Zürich: LIT.
- Jeffery, Bob, 2018, "‘I Probably Would Never Move, but Ideally Like I’d Love to Move This Week’: Class and Residential Experience, Beyond Elective Belonging." *Sociology* 52(2): 245-261.
- Jennings, Brian M. and Richard S. Krannich, 2013, "A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Foundations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among Seasonal and Year-Round Residents." *Rural Sociology* 78(4): 498-527.
- Kan, Kamhon, 2007,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1(3): 436-457.
- Kao, Yu Hui and Stephen G. Sapp, 2020a, "Is Community Attachment a Determinant of Actual Migration? An Estimate of the Social Capital, Linear-Development, and Systemic Approach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01(1): 201-217.
- Kao, Yu Hui and Stephen G. Sapp, 2020b, "Is Social Capital as a Determinant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Sociological Spectrum* 40(2): 136-150.
- Kley, Stefanie, 2011, "Explaining the Stages of Migration within a Life-Course Framework."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4): 469-486.
- Kley, Stefanie, 2017, "Facilitators and Constraints at Each Stage of the Migration Decision Process." *Population Studies* 71: 35-49.
- Klimt, Andrea, 2014, "Searching for Continuity and Connections: Narratives of Belonging from a Post-Industrial City."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5(4): 31-44.
- Lee, Yeon Kyeong and Seung Jong Lee, 2019,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lations on Migration Intention: Focusing on Local 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Well-Being* 2(3-4): 193-211.
- Lewicka, Maria, 2011,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3): 207-230.
- Logan, John R. and Richard D. Alba, 1993, "Locational Returns to Human

- Capital: Minority Access to Suburban Community Resources.” *Demography* 30(2): 243-268.
- Martinez-Fernandez, Cristina, Ivonne Audirac, Sylvie Fol, and Emmanuèle Cunningham-Sabot, 2012, “Shrinking Cities: Urban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6(2): 213-225.
- Martinez-Fernandez, Cristina, 2012, “Demographic Change and Local Development: Shrinkage, Regeneration and Social Dynamics.” *Working Paper*. OECD Local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LEED).
- Massey, Douglas S. and Brendan P. Mullan, 1984, “Processes of Hispanic and Black Spatial Assimi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4): 836-873.
- Massey, Douglas S. and Nancy A. Denton, 1985, “Spatial Assimilation as a Socioeconomic Outco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1): 94-106.
- Massey, Douglas S.,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3): 431-466.
- Massey, Douglas S.,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1994, “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The North American Cas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4): 699-751.
- Miller, Emily E. N. and Kathryn Edin, 2022, “Coming of Age in Appalachia, Emerging or Expedited Adulthood?”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8(4): 50-67.
- Mulder, Clara H. and Gunnar Malmberg, 2014, “Local Ties and Family 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6(9): 2195-2211.
- Musterd, Sako, Wouter P. C. van Gent, Marjolijn Das, and Jan Latten, 2016, “Adaptive Behaviour in Urban Space: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Response to Social Distance.” *Urban Studies* 53(2): 227-246.

- Niccolai, Ashley R., Sarah Damaske, and Jason Park, 2022, "We Won't Be Able to Find Jobs Here: How Growing Up in Rural America Shapes Decisions About Work." *RSF* 8(4): 87-104.
- Paton, Kirsteen, 2016, "Elective Belonging and Fixity to Place." Pp. 97-123 in *Gentrification: A Working-Class Perspective*, edited by Kirsteen Paton. London: Routledge.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avage, Mike, Chris Allen, Rowland Atkinson, Roger Burrows, Maria Luisa Mendez, and Paul Watt, 2010, "The Politics of Elective Belonging."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7(2): 115-161.
- Savage, Mike, Gaynor Bagnall, and Brian Longhurst, 2004, *Globalization and Belonging*. London: Sage.
- Savage, Mike, 2008, "Histories, Belongings,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1(2): 151-162.
- Savage, Mike, 2014, "Cultural Capital and Elective Belonging: A British Case Study." Pp. 29-54 in *Social Capital, Social Identities*, edited by Dieter Thomä, Christoph Henning, and Hans Bernhard Schmid. Berlin: De Gruyter.
- Schewel, Kerilyn, 2020, "Understanding Immobility: Moving Beyond the Mobility Bias in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4(2): 328-355.
- Shucksmith, Mark, 2012, "Class,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Areas: Beyond Social Exclusion?" *Sociologia Ruralis* 52(4): 377-397.
- Sousa, Sílvia and Paulo Pinho, 2015, "Planning for Shrinkage: Paradox or Paradigm."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3(1): 12-32.
- Spring, Amy, Elizabeth Ackert, Kyle Crowder, and Scott J. South, 2017, "Influence of Proximity to Kin on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Destination Choice: Examining Local Movers in Metropolitan Areas." *Demography* 54(4): 1277-1304.
- Spring, Amy, Elizabeth Ackert, Sarah Roche, Dionne Parris, Kyle Crowder, and Nicole Kravitz - Wirtz, 2023, "Keeping Kin Close? Geographies of Family Networks by Race and Income, 1981-2017."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5(4): 962-986.

Stockdale, Aileen and Tialda Haartsen, 2018, "Editorial Introduction: Putting Rural Stayers in the Spotlight."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4(4): e2124.